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八十五期
2016年11月　　頁175~217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6.85.05

宋初南北文士的互動與南方文士的崛起
——聚焦於徐鉉及其後學的考察*

張　維　玲**

摘　要

一般認為，宋初南方降臣在政治上遭到歧視性的待遇，南方文士也必須靠科舉才能在仕途上有所表現，但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本文探討宋初降臣中一個特殊群體：徐鉉及其後學。本文指出，徐鉉入宋後得到以李昉為核心的北方文士不同尋常的敬重，這群北方文士更不遺餘力地舉薦徐鉉後學。這使他們獲得較多入仕中央的機會。不過，太宗對江南降臣的猜忌，導致徐鉉晚年遠貶放州，進一步使李昉、徐鉉後學的關係產生變化。然而，徐鉉後學並未從此沉寂，其中杜鎬、陳彭年、王欽若，在真宗朝獲得君主的信任，他們靈活利用徐鉉崇拜唐玄宗的政治理念，而為真宗大中祥符時代的神道禮儀提供了部分思想資源。徐鉉後學之政治影響力，也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度。

關鍵詞：徐鉉　李昉　王欽若　大中祥符

104.09.23 收稿，105.05.02 通過刊登。

* 初稿以篇名〈從徐鉉的人際網絡與道教思想論大中祥符時代的形成〉，宣講於 2013 年 9 月 2 日「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辦。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學界一般認為，南方降臣入宋後頗遭歧視。王旦（957-1017）試圖阻止宋真宗（997-1022在位）任命王欽若（962-1025）為相的說詞：「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1]是學界經常引用的論據。然而，這並不意味南方降臣入宋後，全然失去拓展仕途的空間，也不意味探討宋初政局的發展，可以無視南方降臣的存在。其中，徐鉉（917-992）及其江南故舊入宋後的政治際遇，頗為特殊。他們不但一度獲得北方文士突出的禮敬，而且在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時代，為此時的神道禮儀提供了部分思想資源。

宋太祖（960-976在位）開寶四年（971），南唐去國號「唐」，自稱「江南」，以對北方虎視眈眈的趙宋表示臣服。但卑躬屈膝並未改變被趙宋收入版圖的命運，開寶八年（975）底，宋軍攻下金陵（今南京），「江南」併入宋朝，趙宋完成了統一南方最關鍵的一步。[2]隔年初，江南國主李煜和五十五位降臣來到太祖面前，接受太祖一一閱視。[3]太祖對每人的印象，決定了他們新的官職。其中許多人遭到罷遣，也有許多人得到幕職州縣官，少數江南名臣得以留在中央。後者如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從四品上；張洎（933-996）為太子中允，正五品下；而江南宰相湯悅（生卒年不詳）為太子少詹事，則為正六品。舊官職與新官階的不完全相稱，體現大國皇帝掌握著降臣的命運。此外，江左降臣受到一些歧視性的規定：他們不論官品，都一律服綠，「以識別於中國也」，這種不平等要到太宗淳化元年（990）才取消。[4]然而，江南作為較晚併入宋朝的

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90，天禧元年八月庚午，頁 2075。

2 南唐併入趙宋的過程，參見鄒勁鳳，《南唐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1-154。由於南唐在開寶四年已去唐號，因此，宋初君臣多以江南、江表、江左稱之。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0，開寶二年六月，頁 22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開寶九年四月癸卯，頁 36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三月，頁 54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至道元年四月，頁 311。因此，江南、江表、江左等稱呼，既是地理區域的概念，也是指南唐過去的統治區域。包含江南東、西路全部，兩浙路的常州、潤州，及福建路的汀洲、建州和南劍州。

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開寶九年正月，頁 361。

4 宋・王林，〈改江南官服色〉，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4，頁 32。此段有關南唐降臣入宋後的命運，參見伍伯常，〈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方大國，其降臣入宋後又受此不平等待遇，反而有助於加強他們的內部凝聚意識。

正是身為江南降臣之一的徐鉉，留下了趙宋現今可見的最早一部文集：《徐公文集》。徐鉉的既有研究，多論及他註解《說文解字》的貢獻，及其在宋初文學領域的重要性；[5]相對而言，他在宋初政局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尚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檢視《徐公文集》可以發現，入宋後的徐鉉，不但與其江南故舊保持聯繫，更值得注目的是，他同時與以李昉（925-996）為首的北方文士群密切往來。

藉由探討徐鉉入宋後的人際網絡及其政治思想，本文試圖從政治史的角度，分析徐鉉及其江南後學在宋初政壇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宋初中央文士群體中所佔據的位置。將試著說明：其一，宋太宗一朝，以徐鉉為首的江南文士，與以李昉為首的北方文士，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並指出徐鉉及其江南後學，憑其廣博的學識，在宋太宗（976-997在位）一朝獲得北方文士相當特殊的禮遇，這使他們比其他降臣獲得更多進入朝廷、擔任文職的機會；儘管由於太宗不信任南士，使太宗朝南士的政治地位遠不及北士。其二，太宗朝北士相對於南士所佔據的政治優勢，在真宗朝發生變化。徐鉉儒道合一、推崇唐玄宗（712-756在位）的政治思想，在其過世後，得其後學杜鎬、陳彭年、王欽若的利用，而成為真宗（997-1022在位）朝大中祥符時代神道禮儀的主要理念來源之一。正是在大中祥符時代，徐鉉後學的政治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群南士的政治地位，也達致足以抗衡北士的地步，然雙方的權力鬥爭也因而激化。

二、徐鉉的仕宦經歷與學術聲望

本節藉由探討徐鉉的仕宦經歷與學術興趣，以作為理解其影響力的基礎。徐鉉的祖籍在兩浙路越州。其父徐延休為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間進士，唐末大亂之際，逃至江南，依附據有洪州的鐘傳。此後江南由南吳、南唐統治，延休及子鉉、鍇（920-974）皆仕宦於江南政權。徐鉉在南唐時仕途不算順遂，

論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0 期（2001 年 11 月），頁 1-31。

5 徐鉉註解《說文解字》的研究很多，此不贅述；而論及徐鉉文學成就的論著，可參見張興武，《宋初百年文學復興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1-15、133-136；沈松勤，〈從南北對峙到南北融合：宋初近百年文學的演變歷程〉，《宋代政治與文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129-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為捲入政治鬥爭而三次遭貶，[6]除貶官時期，徐鉉多在中央任職，由於擅長文詞，主要擔任知制誥與翰林學士。[7]

徐鉉入宋前引人注目的事跡，莫過於在南北戰事方興之際，二度出使宋朝，企圖以其雄辯的才能，請求緩兵。據說徐鉉「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8]徐鉉欲以言詞論說力挽狂瀾，或許是忽視了政治現實，但他敢於在大國君主面前爭辯不休，還是讓江南與北宋君臣都刮目相看。徐鉉入宋後，其忠誠也受到太祖的欣賞。[9]

徐鉉入宋後不到一年，宋太宗即位。太宗「素知公之文學優贍」，[10]於是命徐鉉直學士院，擔任與翰林學士一般的起草內制之職。[11]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徐鉉出學士院，遷官右散騎常侍，判尚書都省。在此期間，徐鉉參與太宗朝三大類書的編寫。可見徐鉉入宋後，都是負責文辭相關工作，從未掌握實權。

在學識方面，徐鉉成長於儒學特別興盛的南唐，[12]且初入仕便為校書郎，得以看到豐富的國家藏書，「繇是經史百家爛然于胸中矣」，[13]擁有廣博的知識。他在江南時，「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14]連北方君臣也久仰其名。[15]儒術之外，徐鉉為文以敏速著稱，[16]陳彭年指徐鉉兄弟在南唐時

6 金傳道，〈徐鉉三次貶官考〉，《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第 19 卷第 3 期（2007 年 5 月），頁 99-103。

7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四部叢刊正編》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215。
為節省篇幅，本文以下凡引用《徐公文集》均出自於《四部叢刊正編》第 39 冊，不再贅述。

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6，開寶八年十月、十一月，頁 347-348、350。

9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6。

10 同上註，頁 215。

11 直學士院與翰林學士職任相同，但由資淺者擔任。見龔延明，〈宋代學士院名物制度志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8 年第 2 期，頁 52-60。

12 見林瑞翰，〈南唐之經濟與文化〉，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2 輯第 2 冊（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頁 137-144。

13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5。

14 宋・史溫，《釣磯立談》，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5019。

15 見宋・岳珂撰，〈徐鉉入聘〉，吳企明點校，《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頁 3。

16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已是「當代文宗」。[17]

徐鉉對禮儀知識的掌握，在宋初的文士群中佔據權威地位。丁謂（966-1037）提到王旦回憶父親王祜的喪禮，當時滿朝權貴都來祭弔，只有徐鉉帶著「麻袍角帶」，進入「客位」內更換後才入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喪慰問，深不可也」。[18]此事透露，當徐鉉在公眾場合的禮儀行為表現得與眾不同時，他人並不認為是徐鉉行為怪異，反而大悟眾人之失。這從側面映照出時人對徐鉉熟諳禮儀的認知。

徐鉉在文字學上的成就為古今習知，宋太宗命他校訂許慎《說文解字》。[19]此外，徐鉉也精於隸書、小篆，也精通大篆（籀文），「當世士大夫有得其書者，無不寶之以為楷法」。[20]他對史學也頗有心得，其文集數次提到時人因重視自己的史學能力，而來求寫碑記。[21]徐鉉對道家與道教思想也有深入的認識，這點留待後文再加分析。

一則趣聞生動地說明了徐鉉的博學如何深刻烙印在時人的印象中：

> 太宗剋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秘閣。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也。[22]

徐鉉分析象膽位置的方式看似匪夷所思。若不執著於故事的真實與否，而是思索這樣的故事何以流傳，恐怕背後反映的心態正是徐鉉廣博的學問，令北方君臣感到既敬又畏，以致不管徐鉉的論點為何，時人幾乎以真理看待。總之，以宋初的學術水平而論，徐鉉在儒術、文學、禮學、小學、史學上都有很深的造

17 宋・陳彭年，《江南別錄》，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138。

18 宋・丁謂，《丁晉公談錄》，《百部叢書集成》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百川學海》癸集），頁 3-1。

1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7，雍熙三年十一月，頁 625。

20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5。

21 宋・徐鉉，〈揚州府新建崇道宮碑銘并序〉，《徐公文集》，卷 26，頁 178；宋・徐鉉，〈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徐公文集》，卷 28，頁 196。

22 宋・文瑩，〈太宗得文臣徐鉉〉，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詣，被認為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三、徐鉉與北方「核心文士」的交遊

學界過去認為，宋初君臣對南方降臣相當歧視，然而，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徐鉉入宋後，以其學術威望為憑藉，加上「性質直，無矯飾」的作風，[23]非但未因降臣身分受排擠，反而獲得許多北方核心文士的敬重。本節將勾勒徐鉉與哪些北方核心文士交遊。

本文指涉的「核心文士」，乃指擔任過兩制與館職的士大夫。「兩制」即翰林學士與知制誥。他們負責草擬各式官方文書，能勝任者是當時被認為最有學識的文士，其中翰林學士更兼有皇帝顧問的角色，是執政大臣的晉身跳板。「館職」則指在三館、秘閣擔任文字工作的文臣，他們往往是兩制的儲備人才。[24]為避免行文冗贅，所提及的北方核心文士，僅做簡要的介紹。

在徐鉉的北方友人中，李昉為關鍵人物。李昉是河北西路深州饒陽縣人，於太祖建隆元年至三年（960-962）、開寶二年至太平興國八年（969-983）任翰林學士，[25]太平興國八年（983）七月因出任參知政事而離任，十一月升任宰相，雍熙四年（987）罷相後，淳化三年（992）二度入相。[26]足見李昉在宋初政壇與文壇的地位。李昉和徐鉉交好，始於太平興國元年。原本李昉獨任翰林，太宗令徐鉉直學士院，[27]與李昉分擔起草內制之責。李昉自言「是時昉與公以同道相知，論交契之始也。」[28]此語出自李昉為徐鉉所寫墓誌銘，可見李昉與大他七歲的徐鉉一見如故。為徐鉉寫墓誌，亦反映兩人交情匪淺。李昉不僅與徐鉉交好，「江南平，士大夫歸朝，昉多與游。」[29]後文將陸續提及，與李昉相熟的江南士大夫多為徐鉉故舊，合理推斷，其中應有徐鉉的引介。

李昉所作徐鉉墓誌，提及景仰徐鉉的北方文士：

2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開寶九年正月丙子，頁 362。

24 參見陳元鋒，《北宋館閣翰院與詩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8-59。

25 陳元鋒，〈宋太祖朝翰林學士述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1 期，頁 56-61。

26 元・脫脫等，〈李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65，頁 9135-9137。

27 除了徐鉉，湯悅也被命直學士院，有關湯悅的記載相當少，其人際網絡亦頗不清楚，因此本文省略不論。

28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5。

2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至道二年二月壬申，頁 8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盖，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公祜負才尚氣，未嘗輕許人，及見公，常言于朝曰：「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公亦曰：「王公詞如江海，心無城府，真奇士也。」[30]

下面以此條史料為基礎，分論李穆、王祜二人與徐鉉的交情。

李穆（928-984）是開封府陽武人，太宗初年任館職，太平興國八年任翰林學士。同年十一月，李昉任相，同月，李穆任參知政事，[31]可見兩人先後在翰林院與政府為同僚。李穆善長文辭與篆隸，[32]徐鉉正是這些方面的前輩。李穆在開寶八年曾出使江南，見到徐鉉兄弟的文章，曾感嘆地說：「二陸不能及也」。[33]墓誌稱李穆讚許徐鉉是江南唯一「中立有道」之士，顯示李穆對徐鉉的讚賞。

王祜（924-987）為河北東路大名府人，篤志於詞學，太平興國中任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徐鉉、李昉等併掌內外制，而後出知開封府。[34]李昉稱王祜不輕易讚許他人，但竟以「文質彬彬、學問無窮」推崇徐鉉。王祜去世後，即由徐鉉為其文集作序，提及相互欣賞彼此的文章，兩人「傾蓋甚歡，恨相知之晚也」。[35]值得注意的是，王祜是真宗朝名相王旦之父。徐鉉稱王祜文集由諸子編成後親自拿來給自己作序，其中王旦或是請託徐鉉的「諸子」之一。

從楊徽之（921-1000）的墓誌銘可知，共同推賞徐鉉的李昉、李穆、王祜本即互相友好：

> （楊徽之）平生以風鑒自高，而寡合於世，前輩惟故相李昉、貳卿王祜深相推挹；僕射石熙載、參預李穆、賈黃中與為文義之友。[36]

30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6。

3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申，頁 558。

32 元・脫脫等，〈李穆〉，《宋史》，卷 255，頁 9105-9107。

33 宋・王稱，〈徐鉉〉，《東都事略》，卷 3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4。

34 元・脫脫等，〈王祜〉，《宋史》，卷 269，頁 9242-9243。

35 宋・徐鉉，〈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徐公文集》，卷 23，頁 161-162。

36 宋・蘇頌，〈文莊楊公神道碑銘〉，《蘇魏公文集》，卷 5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句話說明楊徽之和李昉、王祜、李穆、賈黃中、石熙載（928-984）友好。間接看出欣賞徐鉉的北方文士之間，交情匪淺。李昉在徐鉉墓誌銘提及李穆與王祜，並非偶然。

楊徽之是建州浦城人，在南唐據有江表時，北奔到後周尋求發展。淳化二年（991）以後長期擔任清要館職。在北奔前，楊徽之曾以師禮奉鄉人江文蔚，[37]而江文蔚又與徐鉉交好。[38]徐鉉文集中收錄的祭文，楊徽之即作者之一，其中提到兩人「有舊瀟湘」。[39]徐鉉入宋後，楊徽之既是故友，又與徐鉉的北方友人相熟，兩人有所往來亦在情理之中。

如果上述諸人尚與徐鉉平輩相稱，下面要提及的北方核心文士，便都出生於十世紀第三個十年之後，而屬於徐鉉的學生輩分。就有限的史料而言，有些人物可明確看出與徐鉉關係密切，有些則只能確定他們與徐鉉有所往來或曾經共事。

其一為張去華（938-1006），開封人，建隆初以文章謁李昉，李昉大加讚賞，大概在李昉的延譽之下，隔年張去華就中進士甲科，[40]曾入館職，為直史館。[41]不知是否透過李昉的引介，徐鉉也認識張去華。太平興國七年（982），張任江南轉運使，按部到徐鉉家鄉洪州，建議修白居易祠堂，在洪州知州、通判的協助下修成。徐鉉為之作記，表示「喜儒宗之不墜，嘉使者之得人」。[42]

其二是宋白（933-1009），大名人，太平興國八年任翰林學士。[43]張去華與宋白同於建隆二年（961）登進士甲科，兩人交情深厚，[44]宋白與李昉也熟識。[45]

37 宋・楊億，〈翰林侍讀學士楊公行狀〉，《武夷新集》，卷 1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8。

38 宋・徐鉉，〈江君（文蔚）墓誌銘〉，《徐公文集》，卷 15，頁 103；宋・馬令，〈江文蔚〉，《南唐書》，卷 13，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350。

39 宋・楊徽之等，〈祭文〉，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8。

40 元・脫脫等，〈張去華〉，《宋史》，卷 306，頁 10108。

4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乾德二年正月丁亥，頁 118。

42 宋・徐鉉，〈洪州新建尚書白公祠堂記〉，《徐公文集》，卷 28，頁 192-193。

4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七月，頁 548。

44 元・脫脫等，〈文苑一・宋白〉，《宋史》，卷 439，頁 12999。

4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9，太平興國八年七月，頁 548：「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彥超與文明殿學士李昉、翰林學士宋白善。先是，昉、白詣之，時彥超年六十九，謂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書？』昉具告之。」李昉、宋白既都與王彥超交好，兩人又一起拜訪王彥超，且李昉又賞識宋白好友張去華，則李、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平興國二年（977），在李昉主持下，徐鉉等人參與《太平廣記》的編修，徐鉉欲將自己編的《稽神錄》收入，但不敢自專，便請宋白請問李昉，李昉爽快答應。從徐鉉請宋白代為詢問李昉，[46]也可見徐、宋兩人有所往來。不過，張去華與宋白是否可稱與徐鉉關係密切，沒有更多史料可以論證。但後文將提及，兩人都捲入了徐鉉的貶逐案。

以上提及的李昉、李穆、宋白、張去華，與徐鉉有一共同經歷，即在太平興國四年（979）隨太宗征太原。[47]戰爭期間，太宗每日發布各種命令，都需要文臣草詔。徐鉉則是從征文士中唯一的南方士人。可以想見，這些文士數月來朝夕相處，一起度過兵馬倥傯的生活，有加深友誼的機會。

再次為賈黃中（941-996），河北東路滄州人，太平興國八年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參知政事。[48]前引文提及，賈黃中與楊徽之、李穆、李昉等人友好；從有限的史料可見，賈黃中與徐鉉亦相識。徐鉉為江南後輩劉鸞作墓誌銘，提及雍熙二年，賈黃中知貢舉，徐鉉同知貢舉。劉鸞來京趕考，徐鉉為之延譽，以致賈黃中「重君之文，以為古人之後也，乃第為高等。」可惜劉鸞殿試未能通過，又於次年去世。[49]賈黃中與徐鉉同掌貢舉，而拔擢徐鉉賞識的江南後輩，可見徐鉉的讚譽具有影響力。

徐鉉的北方友人雖多，但較少以弟子自居，李至（947-1001）卻是其一，且是具關鍵性的一位。他是河北西路真定府人，太平興國八年任翰林學士不久升任參知政事；端拱元年（988）李至以秘書監主掌秘閣。真宗即位後，李至第二度出任參知政事。政治經歷顯赫的李至，對官職懸殊的徐鉉幾近崇拜之地步。李至在與楊徽之共作的徐鉉祭文中，自言「受教文字，執弟子之禮」，[50]以徐鉉門人自居；此外，他手寫徐鉉文集，置於桌上；又賦「五君詠」，其中即以

兩人也應交情不錯。

46 李昉的回答如下：「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見宋・袁褧，《楓窗小牘》，《百部叢書集成》第 129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寶顏堂秘笈》第 25 冊），卷上，頁 3-1。

47 元・脫脫等，〈文苑一・宋白〉，《宋史》，卷 439，頁 12998；元・脫脫等，〈張去華〉，《宋史》，卷 306，頁 10109；宋・蘇頌，〈石公神道碑銘〉，《蘇魏公文集》，卷 5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2 冊，頁 1-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0，太平興國四年九月，頁 461。

48 元・脫脫等，〈賈黃中〉，《宋史》，卷 265，頁 9160-9161。

49 宋・徐鉉，〈故鄉貢進士劉君墓誌銘〉，《徐公文集》，卷 30，頁 209-210。

50 宋・李至等，〈祭文〉，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7-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徐鉉為第一，其他則是李昉、石熙載、王祜、李穆，[51]此名單與前引楊徽之墓誌銘相重疊，顯見這些核心文士彼此交好。徐鉉去世後，李至作輓歌五首，首句說：「吾道亡宗匠，明時喪大儒」，[52]不但視徐鉉為當代大儒，甚至推許為吾道之領袖。

其次是蘇易簡（958-996），潼川府路梓州人。[53]是太平興國五年的狀元，太平興國八年被拔擢為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已是翰林學士承旨，[54]淳化四年十月擢任參知政事。[55]可見其仕途得意。他與李昉有詩文唱和，[56]並與李至「奉公（徐鉉）以師友之禮」。[57]蘇易簡著有《文房四譜》，內文多次提及徐鉉，[58]序文亦請徐鉉撰作。序中徐鉉對蘇易簡的學問表達肯定，[59]可見徐鉉以自己的聲望為蘇易簡背書，蘇易簡則以後進之姿推崇徐鉉。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朝三大類書的編纂，不少與徐鉉相熟的北方核心文士參與了編修。《太平廣記》與《太平御覽》有李昉、李穆、宋白參與，《文苑英華》有李昉、李穆、王祜、楊徽之、宋白、賈黃中、李至、蘇易簡參與。[60]後者包含大多數徐鉉的北方友人。本節引述許多史料都呈現他們的私交情誼，部分因素即應來自他們共事的經歷。

但有共事經歷，並不保證建立友誼。與年長於徐鉉的扈蒙（915-986）對比，更可凸顯北方核心文士對徐鉉的禮敬，不同平常。扈蒙為幽州人，太平興國年

51 元・脫脫等，〈李至〉，《宋史》，卷 266，頁 9176-9178。《宋史・藝文志》有李昉、李至的《二李唱和詩》一卷，可見二李關係親近。見元・脫脫等，〈藝文八・集類二・總集類〉，《宋史》，卷 209，頁 5402。

52 宋・李至，〈東海徐公挽歌詞〉，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8。

53 潼川府路位於四川，以地理位置而言屬於南方，為了行文方便，蘇易簡於此討論。

5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2，淳化二年十月辛巳，頁 724。

5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十月，頁 755。

56 宋・楊億口述，宋庠整理，李裕民輯校，《楊文公談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8。

57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6。田況則直接稱「李至、蘇易簡咸師資之」，見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上，《稗海》第 27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20-2。

58 宋・蘇易簡，〈墨譜〉，《文房四譜》，卷 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9-10。

59 宋・徐鉉，〈文房四譜序〉，《徐公文集》，卷 23，頁 162。

60 見郭伯恭，《宋四大書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11-17、52-54、75-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除徐鉉與李昉同在翰林院外，扈蒙也入翰林，太平興國八年，李昉為執政，扈蒙則升為翰林學士承旨。他同時也參與三大類書編修。[61]不過，檢視現有史料，幾乎看不到扈蒙與李昉等文士的私交互動。此外，關於扈蒙的紀載，還呈現時人對他評價不高的認知。據說他「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自止也。」太平興國九年，扈蒙參與封禪禮的制定，取消原本以太祖配天，改以宣祖配天，但「識者非之」。[62]淳化五年，太宗令朝臣重修太祖實錄，蘇易簡聲稱前錄的疏失是因為參與編修的扈蒙「性懦，逼于權勢，多所諱避，甚非直筆」。[63]前文提及蘇易簡禮敬徐鉉，形成對比的是，蘇易簡頗看不起扈蒙。總之，扈蒙雖是北方核心文士之一，也有著顯要的仕宦經歷，但不僅看不到他與李昉等文士的友好紀錄，其聲望也遠不如徐鉉。

本節爬梳徐鉉和北方核心文士的人際交遊，得到以下看法。第一，降臣徐鉉入宋後，不但不受北方文士排擠，反而以其廣博學問，受眾多一流文士推重。其二，推崇徐鉉的北方核心文士，並非互不相識，而是本即相互友好；徐鉉與當中任何一位相交（李昉應是關鍵人物），自然不難認識其交遊網絡中的其他人物。從徐鉉與北方文士的互動情形來看，李至等人所作徐鉉〈祭文〉說：「頃在江左，已聞素屢；及來天庭，孰不仰止。」[64]可稱實錄。下節將探討徐鉉的江南故舊成員，其中徐鉉的北方友人，對提攜徐鉉的江南後輩貢獻不小助力。

四、徐鉉及其江南後學

本節分析徐鉉江南後學的成員，並討論前節所述的徐鉉北方人際網絡，如何嘉惠於其江南後學，而使徐鉉及其後學，成為宋初中央重要的文士群體。其次，略述徐鉉後學的道教傾向，以說明這個群體的宗教特色。本文所指涉的徐鉉江南「後學」，意指與徐鉉同樣來自南唐（江南）政權，且與其友好的故舊與門生。活動於太祖末到真宗朝的江南士大夫，對舊政權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提供了他們入宋後彼此交遊的基礎。

61 元・脫脫等，〈扈蒙〉，《宋史》，卷 269，頁 9239-9240。

62 宋・王稱，〈扈蒙〉，《東都事略》，卷 3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頁 12-13。

63 清・徐松輯，〈運曆一・修實錄・太宗〉，《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57），頁 29。

64 宋・李至等，〈祭文〉，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徐鉉在南唐時已表現出喜好獎掖後進的態度，[65]入宋後，對江南後學的照顧更是不遺餘力，其墓誌銘說：

> 江南故人子弟，暨親族之孤遺者，來投于公，曾無虛月。公分廩祿以卹之，虛館舍以安之，殆于終年，未有倦色。[66]

可以想見，徐鉉的江南故舊、門生如今成為降臣，許多人無法在趙宋謀得一官半職，徐鉉盡己所能地「分廩祿」、「虛館舍」，受其關照的江南後輩，自然容易形成以徐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

不過，徐鉉並非對江南降臣一體均霑，徐鉉在江南時候的人際關係，與其入宋後與江南降臣的往來關係密切，因此此處略加溯源徐鉉南唐時的交遊。首先必須提及與徐鉉交情最篤的朋友之一，南唐名臣韓熙載（902-970）。徐鉉為其作的墓誌銘與祭文，都充分展現兩人交情深厚。[67]韓熙載和徐鉉在南唐時的友人，多有重疊。以下論之。

其一為張洎（933-996）。張洎未出仕前，以文章謁韓熙載，韓相當欣賞張洎。[68]該時徐鉉兄弟已享有盛名，但張洎自恃才藻，不肯稍自低下。原本張洎與潘佑友好，而潘佑與徐鉉不協，但不久張、潘交惡，於是張洎傾向徐鉉，兩人漸次交好。[69]江南滅亡後，徐鉉與張洎仍「厚善」。張洎長子張冉於太平興國年間夭折，徐鉉主動為其亡子文集作序。序中提及自己與張洎「以事舊之厚，鍾情特深。」[70]足見兩人交情非同一般。徐鉉的北方友人也善待張洎，李昉「雅厚善張洎」，[71]對於才華早露的張冉，李昉、李穆都「引之登門，特加禮遇。」[72]

---

65 宋・胡克順，〈徐公行狀〉，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1：「公嘗誘掖後進，苟有一善，必延譽之；潔己請益者，亦誨導之不懈。」。

66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6。

67 宋・徐鉉，〈韓公墓銘〉，《徐公文集》，卷 16，頁 114：「鉉與公鄉里遼夐，年輩相懸，一言道合，傾蓋如舊。」；宋・徐鉉，〈祭韓侍郎文〉，《徐公文集》，卷 20，頁 145。

68 宋・馬令，〈後主本紀〉，《南唐書》，卷 3，頁 5487-5488；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卷 2，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060。

69 宋・史溫，《釣磯立談》，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019。

70 宋・徐鉉，〈張氏子集序〉，《徐公文集》，卷 23，頁 163。

7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至道二年二月壬申，頁 828。

72 宋・徐鉉，〈張氏子集序〉，《徐公文集》，卷 23，頁 163。不過，徐鉉晚年似與張洎有些摩擦，宋・錢若水等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稱他：「（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淑（947-1002）也得韓熙載賞識，[73]同時亦為徐鉉門生兼女婿。[74]吳淑的學識範圍與徐鉉多有類似，他為文敏素，擅長篆、籀文，著有《說文五義》、《江淮異人錄》。入宋後，吳淑一度無官可做，頗為困窘；但靠著岳父的人脈，不久就有近臣推薦吳淑試學士院，而後又獲得了大理評事此一京官。[75]

舒雅（？-1009）在南唐時與吳淑齊名，同樣深受韓熙載賞識，既是韓之門生，也是韓的忘年之交。[76]舒雅又學於南唐隱士鄭元素，南唐中主曾招見鄭元素，並安排鄭寄住於徐鉉家。[77]因此，雖然沒有史料直接說明徐鉉與舒雅相熟，但幾乎可以斷定兩人關係匪淺。

杜鎬（938-1013）亦為徐鉉門生，[78]以博學強記聞名，南唐時以明經科中舉。入宋後，本只任一縣主簿，太宗即位後，「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於是改為京官，並得崇文院檢討此一館職。[79]合理推斷，「江左舊儒」應包含他受人崇敬的老師徐鉉。太宗於端拱元年（988）設置秘閣，以李至為秘書監，主持秘閣事務。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李至推薦的秘閣校理清一色都是徐鉉後學：吳淑、舒雅、杜鎬，[80]李至既尊徐鉉為師，提攜「同門」，自不意外。

泊）常與故散騎常侍徐鉉厚善，心重之，因議事小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於篋笥，甚於珍玩，此奇異也。」見宋・錢若水等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至道三年正月己丑條，頁 787。兩人是否會因「小不協」就將深厚的情誼破壞殆盡，頗可懷疑，徐鉉去世後，祭文即由張洎與李至、楊徽之共寫。祭文提及張、楊與徐鉉「敦故人之契」，因此「迎旅櫬于西郊」，見宋・張洎等，〈祭文〉，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7-218。宋・錢若水等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在張洎卒的至道三年正月己丑一條，注 4，引《涑水記聞》指楊億作張洎國史本傳，「極言其短」，頁 788。則張洎國史本傳說兩人絕交或亦言過其實。

73 元・脫脫等，〈文苑三・吳淑〉，《宋史》，卷 443，頁 13040。

74 宋・胡克順，〈徐公行狀〉，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2。

75 元・脫脫等，〈文苑三・吳淑〉，《宋史》，卷 441，頁 13040-13041。

76 宋・馬令，〈歸明傳上〉，《南唐書》，卷 22， 5401。

77 宋・佚名，《江表餘載》，卷下，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115。

78 徐鉉去世後，靈柩回到汴京：「婿國子博士吳淑、門生殿中丞杜鎬，時皆典治中秘書，遂以公凶訃聞。」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5。

79 元・脫脫等，〈杜鎬〉，《宋史》，卷 296，頁 9876。

80 宋・宋綬，〈宋舒館直雅傳〉，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94 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元・脫脫等，〈文苑三・吳淑〉，《宋史》，卷 441，頁 130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潘慎修（937-1005）在南唐官至刑部尚書，入宋後任李煜王府記室。李煜於太平興國三年去世後，潘慎修便長年在外任官。不過，潘慎修與徐鉉後學仍保持密切往來。據楊億為其所寫墓誌，潘慎修與張洎聯姻，將女兒嫁給張洎子。[81]在赴湖州任上，徐鉉作〈送潘湖州序〉說：「視衆君子之詞，知成德（潘慎修字）之為人矣。某辱事舊之尤者，是用冠於篇首。」徐鉉自稱「事舊之尤者」，可見當時為潘慎修送別的，還包含不少江南士大夫。此外，徐鉉提到「閣長隴西公，敦義聳善，賦詩寵行。」[82]「隴西公」即為時任秘書監的李至。可見李至不但師事徐鉉、舉薦其門生，還參與徐鉉江南故舊的私人活動。淳化中，李至仍在秘書監任上，此時潘慎修知梓州任滿，李至便推薦潘慎修直秘閣。[83]

刁衎（945-1013）在南唐時很得李煜寵信。入宋後，刁衎多年未能任官，太平興國七年，「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李昉貴為翰林學士，竟鼓勵無官無職的江南舊臣，很可能也是透過徐鉉的關係。「勉其出仕」說得委婉，實際上他們向太宗推薦刁衎，於是刁衎獻〈聖德頌〉，得知兩浙路睦州桐盧縣，太宗後期，刁衎仍長年外任。[84]刁衎外任時，仍與徐鉉聯繫，兩人時有詩文往來。[85]

樂史與王克貞亦為徐鉉江南故舊。樂史（生卒年不詳）在南唐時已進士及第；太平興國五年再中進士，但太宗以樂史已有官階而延遲授予科名。雍熙三年，樂史知舒州，徐鉉為其送行，寫下〈送樂（學）士知舒州〉，後又寫〈寄舒州樂學士〉，可見兩人之交情。[86]王克貞（929-988）為江文蔚門生，[87]其墓誌銘由徐鉉撰作，文中徐鉉回憶「君始從鄉薦，余已典綸誥，謬爲先達，屢辱請益。」[88]可見王克貞以後輩自居，常向徐鉉問學。

以上提及的徐鉉後學，不少人曾參與太宗時三大類書的編修。《太平廣記》

81 宋・楊億，〈潘公墓誌銘〉，《武夷新集》，卷 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頁 20-21。

82 宋・徐鉉，〈送潘湖州序〉，《徐公文集》，卷 24，頁 164-165。

83 元・脫脫等，〈潘慎修〉，《宋史》，卷 296，頁 9875。

8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3，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頁 532-533；元・脫脫等，〈文苑三・刁衎〉，《宋史》，卷 441，頁 13051-13052。

85 宋・徐鉉，〈鄴都行在和刁秘書見寄〉，《徐公文集》，卷 21，頁 150；宋・徐鉉，〈和李太保寄刁秘書〉、〈又和刁秘書寄李太保〉，《徐公文集》，卷 22，頁 155-156。

8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1，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甲寅，頁 437；元・脫脫等，〈樂黃目〉，《宋史》，卷 306，頁 10111；宋・徐鉉，〈送樂（學）士知舒州〉、〈寄舒州樂學士〉，《徐公文集》，卷 22，頁 153-154。

87 宋・徐鉉，〈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徐公文集》，卷 18，頁 130-131。

88 宋・徐鉉，〈大宋故尚書戶部郎中王君墓誌銘〉，《徐公文集》，卷 29，頁 200-2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參與者就有徐鉉、張洎、吳淑；《太平御覽》的參修者，除前三人，還有舒雅、王克貞；《文苑英華》的參修者則有徐鉉、吳淑、舒雅、杜鎬。[89]合併前節所述，三大類書的編修者，徐鉉的北方友人加上江南後學即佔絕大多數。這意味著並非所有文臣都有機會參與修書工作，人際網絡在編修人員的選擇上發揮重要作用。[90]

江南滅亡後，眾多降臣失去原本清高的品位，他們如何擺脫不平等的待遇？應考科舉是其中一途，[91]但並非唯一途徑。本節考察徐鉉的江南後學成員，他們多數在江南未亡時就與徐鉉親識；徐鉉入宋後，以其博學才識，深得北方核心文士敬仰，這使徐鉉的門生故舊擁有比其他降臣更多優勢，得以在徐鉉北方的有勢同僚幫助下，任職中央，擔任清要館職、編修類書。這使徐鉉及其後學在入宋後不久，成為李昉文士群之外，另一股佔據中央朝廷的文士勢力。這是其他降臣所無法擁有的際遇。然而，這些江南文士需要北方文士的薦舉，實際上也反映他們的地位仍遠不如北士。

後文將進一步勾勒徐鉉個人具道教特色的政治思想，此處略述徐鉉故舊的道教傾向，以說明此群體與道教較為親近的特色。首先是張洎，「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92]可謂佛、道兼通。徐鉉稱其子張冉：「探釋老玄言，讀華陽諸真經，飄然有脫落塵滓之志。」[93]可見其嚮往道教成仙之說。其次為舒雅，他在咸平末知舒州，為江南舊統治地，據稱舒雅「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舒潛山靈仙觀，有勝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94]舒雅請掌靈仙觀直到東封結束後，可見其道教興趣。再次如潘慎修，「多讀道書，善清談」。[95]又如樂史，著有《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諸仙傳》二十五卷、

89 見郭伯恭，《宋四大書考》，頁 11-17；52-54；75-85。

90 關於太宗朝江南士大夫參與三大類書的編修，是否是太宗欲攏絡南方文士這一問題，筆者較同意郭伯恭的分析與看法，即認為太宗下令修書，是為了獲得右文令主之名，用江南降臣，也僅是以其文學優贍。見郭伯恭，《宋四大類書考》，頁 2-4。筆者同意郭伯恭意見的原因，在於下文將分析太宗對徐鉉的態度，太宗自視為大國君主，不但沒有攏絡江南降臣的必要，甚至隨時可以將聲望隆盛的徐鉉驅逐外貶。

91 見伍伯常，〈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亂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0 期（2001 年 11 月），頁 1-31。

92 元・脫脫等，〈張洎〉，《宋史》，卷 267，頁 9215。

93 宋・徐鉉，〈張氏子集序〉，《徐公文集》，卷 23，頁 163。

94 宋・宋綬，〈宋舒館直雅傳〉，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94 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6 冊，頁 2。

95 元・脫脫等，〈潘慎修〉，《宋史》，卷 296，頁 98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後又將所著與神仙相關事編成《仙洞集》百卷。[96]

以徐鉉為首的江南士大夫群，或許不是每一位都喜好道教，但他們當中不少人有道教傾向，依然構成這個群體的特色。這點必須考慮當時的宗教版圖，即佛教遠比道教興盛。宋朝初期「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97]而江西即屬於南唐舊統治區。不過，這只能說江西等地，道教較其他地方興盛，而非江西地區道教盛於佛教。[98]南唐後主特別崇信佛教，影響所及，當時大臣也多奉佛，而「徐鉉獨否」。[99]此說法凸顯徐鉉不信佛而信道，在當時屬於少數。徐鉉門生故舊入宋後，離開道教較盛的江南地區，活動於北宋朝廷，其中不少人帶有明顯的神仙道教傾向，更容易顯其特殊性。

五、太宗對南、北文士的不同態度

如果忽略皇帝的角色，將無法深入理解以徐鉉、李昉為核心的南、北文士為何能在宋初朝堂佔據地位。前二節提及的北方核心文士，不少人在太宗朝升任宰輔大臣，顯示太宗看重的，不僅是他們的文采。本節將探討太祖、太宗重視北方核心文士的因素，如何聯繫於君主對政權合法性的關注；再對比太宗對徐鉉的態度，以分析徐鉉去世前、後，其後學經營仕途的模式變化。

北方核心文士能獲得太宗重視，而時居宰輔之位，並非單用「重文抑武」可解釋。放在五代到宋初的政治局勢，頻繁戰爭需要武將，複雜的政務則需要像趙普這樣的能吏型官僚，[100]李昉等文士能占據一席之地，不能忽略君主對儒教祭天之禮的重視。帝制中國的君主南郊祭天儀式，具有宣示天命所歸的意義，象徵著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101]一旦君主認識到禮儀的象徵意義，掌握儒教

96 元・脫脫等，〈樂黃目・父史〉，《宋史》，卷 306，頁 10111。

9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頁 1637

98 徐鉉為撫州永安禪院所作記文，說「炎靈之後，釋氏特隆，經法之盛參乎先聖，祠宇之設廣於虞庠」。見宋・徐鉉，〈撫州永安禪院記〉，《徐公文集》，卷 28，頁 194。

9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乾德五年三月，頁 193。徐鉉為一禪師所寫墓誌銘，就直接地說：「鉉非學釋氏者，不能言其道業。」見宋・徐鉉，〈故唐慧悟大禪師墓志銘并序〉，《徐公文集》，卷 30，頁 205。

100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論》（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51-156。

101 見甘懷真，〈西漢郊祀禮的成立〉，《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35-80。五代初期的君主曾試圖用南郊祭天來宣示政權具合法性，而重視禮樂，勢必導致任用文官。參見傅樂成，〈唐型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禮經知識的文士，就易得君主重視。

太祖對禮儀的重視，即觸發於北宋郊祀禮的舉行。[102]據稱太祖因為見識到翰林學士盧多遜在郊祀禮的進行過程中，「升輅執綏，且備顧問」，對於太祖的提問「占對詳敏，動皆稱旨」，而使原本不太重視儒士的太祖，意識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103]足見「儒者」在太祖眼中有做宰相的資格，是看中他們能利用儒教禮經中的知識。

基於「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的理念，在「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的背景下，太祖命文臣展開《開寶通禮》的編修，參與編修的有：「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104]其中賈黃中、李昉、扈蒙是前文提及的核心文士。又根據張文昌的研究，《開寶通禮》的編纂是在盧多遜的主持下完成。[105]事實上，盧多遜也與李昉等核心文士頗有往來。盧多遜於太祖朝先後任知制誥、翰林學士，開寶六年升任參知政事，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106]李穆與盧多遜「雅相親厚」，因此在盧多遜遠貶時也受責貶官。[107]總之，包含盧多遜在內的李昉交遊網絡，是一群熟悉儒教祭禮知識的核心文士。

太宗對祭禮的重視更勝太祖，也正是在太宗朝，北方核心文士獲得更多位居宰執的機會。開寶九年十月，太宗即位當月，盧多遜升任宰相，直到太平興國七年四月，趙普指其交通廷美而遠貶崖州。[108]此後，趙普雖繼續任相，但能

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339-382；方震華，〈正統王朝的代價——後梁與後唐的政權合理化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2005 年 6 月），頁 55-84；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 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102-103.

10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頁 108。

103 宋・王曾，《王文正公筆錄》，《百部叢書集成》第 11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百川學海》己集），頁 7-2。

104 元・脫脫等，〈吉禮一〉，《宋史》，卷 98，頁 2421。

105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頁 138-160。

106 見宋・錢若水等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卷 76，至道二年二月癸酉，頁 659。

10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3，太平興國七年四月壬午，頁 518。

10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2，開寶四年十二月己卯，頁 275；宋・李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吏型的趙普，一旦遇到朝廷大禮，便顯得力有未逮。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兗州父老請太宗封禪，在此前後「普恩禮稍替」，[109]太宗「將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大政」，[110]於是，李昉於七月離任翰林學士，升任參知政事，十一月趙普罷相，李昉與宋琪任相。[111]封禪是太宗相當重視的大禮，[112]若沒有知禮的宰相主政，不免窒礙難行。同時李穆、李至也從翰林學士升任參知政事。[113]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太宗答應群臣的封禪請願，以李昉為首的執政班底，可說是為此年封禪禮所作的準備。

雍熙末，太宗決定再相趙普，卻沒有立刻將李昉罷相，原因是端拱元年正月「上以方講籍田，稍容忍之」。[114]可見籍田大禮的舉行，稍微延長了李昉的任期。這次籍田禮，由宋白、賈黃中、蘇易簡詳定儀注。毫不意外，他們都屬以李昉為核心的北方文士。

不過，只要太宗重視祭天之禮，李昉派文士就有再任宰執的機會。淳化二年九月，李昉再度任相，與張齊賢並相。賈黃中、李沆則從翰林學士升任參知政事。賈黃中既為李昉交遊網絡中的一員，又曾參修《開寶通禮》，對禮儀當有相當的了解。淳化三年十一月舉行南郊大禮，[115]四年正月又舉行祈穀祭天大禮，[116]這段期間由核心文士主政，應非巧合。[117]四年十月，李昉、賈黃中、李

《續資治通鑑長編》，開寶六年九月己巳，頁 307-308；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開寶九年十月，頁 382-383；趙普與盧多遜的鬥爭，參見何冠環，《論宋太宗朝之趙普》（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羅球慶先生指導，1979）。

10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七月，頁 549。

110 宋・王稱，〈李昉〉，《東都事略》，卷 3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頁 9。

11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子，頁 556。

112 封禪象徵「太平」到來的政治文化意義，及宋太宗渴望封禪的史實，參見張維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清華學報》2013 年第 3 期，頁 481-524。

11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申，頁 558。

11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9，端拱元年二月，頁 647。

11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3，淳化三年十一月己亥，頁 704。

11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正月辛卯，頁 745。

117 依照山內弘一的整理，太宗在太平興國三年、六年、九年、端拱元年、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共六次舉行大禮，見山內弘一，〈北宋時代の郊祀〉，《史學雜誌》，第 92 編第 1 號（1983 年 1 月），頁 40-66。其中盧多遜在前二次為相，李昉在後三次為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沆同遭罷政，原因是遭天災挫折的太宗責怪他們「既得位，乃競為循默」。[118]這些博學文士，操辦禮儀或許得心應手，但遇到實際政務，在太宗眼裡他們顯得力有未逮。

相較於對北方核心文士的器重，太宗與徐鉉及其後學則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太平興國八年六、七月的翰林院人事任命更動中，徐鉉被調離翰林院，擔任判尚書都省，幾近閒差；[119]李昉則升為執政大臣，扈蒙升為翰林學士承旨，同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入翰林院。[120]這場人事安排，大為提高了李昉等北方文士的政治實力，相對地，徐鉉代王者言的職位遭到剝奪。

太宗對徐鉉的觀感，部分來自於徐鉉入宋後，仍不改尊敬故國、故主之意。在北宋的文人筆記中，太宗對此的反應，有兩種幾乎相反的紀錄。田況（1005-1063）的《儒林公議》，稱太宗令徐鉉編《江南錄》，徐鉉在文末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導致「太宗頗不悅」。[121]而魏泰（生卒年不詳）《東軒筆錄》則稱，有人為了中傷徐鉉，而向太宗推薦由徐鉉撰寫江南後主李煜的墓誌銘，徐鉉受命後，向太宗表示希望在墓誌銘中存故主之意，太宗應許。之後太宗讀了徐鉉所作墓誌銘，「覽讀稱嘆」，後又見徐鉉撰李煜挽詞，「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122]我們或許不需糾結於紀錄的不一致，這兩條紀錄至少都顯示，徐鉉入宋後如何書寫故國、故主，是一敏感的課題；太宗面對此問題的心理也頗為複雜，在嘉許徐鉉忠義的背後，未嘗沒有懷疑徐鉉並未誠心歸降。

雍熙二年（985）五月，太宗與葛湍的對話，可以看出太宗對徐鉉的複雜心

11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五月壬寅，頁 748。

11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己酉，頁 548。判尚書都省也非全然無事可做。當有典禮上的爭議，皇帝若下詔當議官赴都堂集議，即由判尚書都省事主持。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78；周佳，《聽政・文書・集議：北宋仁宗朝日常政務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鄧小南先生指導，2010），頁 109。可見徐鉉被認為具有主持禮議的能力。雍熙元年三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認為宋應該上承唐代為金德。「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最後便由判尚書都省徐鉉綜合各方的意見做出結論。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雍熙元年四月甲辰，頁 577-578。

120 宋・歐陽修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頁 11。

121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下，《稗海》第 27 冊，頁 12-1。

122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

> 嘗夜召書學葛湍，問：「徐鉉草書如何？」端曰：「鉉留心籀、篆，不聞草聖。」上曰：「鉉嘗見朕書否？ 」端曰：「臣僚非詔賜，無由得觀。」上喜，於軸中出御草書二紙曰：「一以賜汝，一以賜鉉。」[123]

太宗聽聞以書法著稱的徐鉉不擅長草書，便關心徐鉉是否看過自己的草書，接著又主動將自己的草書作品賜與徐鉉。喜好草書的太宗，對於自己擅長徐鉉所不能的領域，似乎有些得意。而從太宗主動問起徐鉉，也可見這位博學的降臣，在太宗心目中並非無足輕重。

不少江南降臣都學識豐富，加上他們不被授予要職，正可成為太宗商討學問的對象。太宗「數召庭臣新安呂文仲、丹陽吳淑、無錫杜鎬等入禁中，令讀古碑及文選江、海諸賦。」[124]然而，三人之中，太宗似乎更信任呂文仲，而非與徐鉉關係親近的杜鎬或吳淑。太平興國八年，太宗命呂文仲為侍讀，不久任翰林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出經史令讀，或就訪外事。」[125]呂文仲雖是江南降臣，也參與三大類書的編修，但從現有資料看不出他與徐鉉及其後學有任何友好紀錄，只知他「久居禁近，周密兢慎」[126]。總之，至少在徐鉉過世前，其故舊門生並未獲得太宗的親信。

基於上述，可以進一步討論導致徐鉉遠貶邠州的道安一案。起先，廬州僧尼道安到開封府控告兄蕭獻臣、嫂姜氏不養母姑。當時開封府判官張去華不處理此案件，且將道安押送回廬州。淳化二年，道安再度來到開封，這次她擊登聞鼓，聲稱因為姜氏是徐鉉妻子的姪女，先前因徐鉉寫信向張去華請託，張去華才不處理該案。駭人聽聞的是，這回道安控告徐鉉與姜氏通姦。可以想見，徐鉉已高齡七十五歲，以他的聲望、地位而遭此指控，對其名譽將造成何等打擊！太宗大感吃驚，於是將徐鉉、道安、蕭獻臣、姜氏及張去華羈押，並下令詳查。這位學術泰斗突然便淪為階下囚。大理寺和刑部調查後，一致聲稱徐鉉

123 宋・王應麟，〈聖文・雍熙草書〉，《玉海》，卷 3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1，王應麟自注出自太宗實錄。

12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庚辰，頁 559。

125 宋・宋綬，〈呂侍郎文仲傳〉，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 94 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6 冊，頁 3。

126 同上註，頁 5b。呂文仲是宋朝第一位翰林侍讀，見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的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35-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姜氏並無姦情，且道安應該以誣告罪反坐。弔詭之處在於，太宗雖然懲罰了道安，但也不滿刑部、大理寺的判斷，結果大理寺、刑部、開封府相關官員全遭到了罷黜與貶官。[127]

此案件牽連了幾位與徐鉉有交情的北方文士。其一即張去華，他被削一任，貶安州司馬。[128]據稱宋白因與張去華交好而同遭貶官，[129]可能宋白也被懷疑涉入其中。時任同判大理寺的向敏中（949-1020），因張去華是其舅父，避嫌而未參與這次審案，但仍未能逃過貶竄。有好事者說向敏中「雖避嫌疑，猶涉黨援」，而遭出知廣州。[130]另一位遭貶的是判大理寺王禹偁（954-1001），他曾在端拱、淳化初年，受太宗之命與徐鉉一起校訂道藏。[131]此時，他站出來為徐鉉鳴不平之冤，「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最後貶商州團練副使。[132]

徐鉉當然也逃不過貶逐，他被貶至陝西邠州，隔年與世長辭。徐鉉靈柩運回京師後，太宗下令出錢二十萬賜其家，洪州義門胡仲堯準備了舟船，親自來到汴京，將徐鉉的靈柩運回闊別十七年的洪州故鄉。[133]

令人不解的是，為何眾口一致聲稱徐鉉受冤，太宗仍將相關人等悉數貶逐？儘管沒有證據可以說明太宗的心思，但可推測的是，引起太宗敏感神經的或許

127 清・徐松輯，〈職官六四・黜降官一〉，《宋會要輯稿》，頁 8。

128 元・脫脫等，〈張去華〉，《宋史》，卷 306，頁 10109-10110。

129 元・脫脫等，〈文苑一・宋白〉，《宋史》，卷 439，頁 12999。

130 宋・祖無擇，〈文簡向公神道碑銘〉，《龍學文集》，卷 1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4。

13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6，大中祥符九年三月，頁 1975：「樞密使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賜目錄名寶文統錄，……舊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常侍徐鉉、知制誥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寫本，送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太宗何時令徐鉉等人校道藏？據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0，端拱二年十月，頁 688；卷 31，淳化元年八月，頁 703，可見王禹偁於端拱元年到淳化元年為知制誥。而該時徐鉉一直為左散騎常侍。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1，淳化元年四月，頁 700，孔承恭由兵部郎中轉太常少卿。至淳化二年，徐鉉被貶官外放，王禹偁亦被貶至解州，見元・脫脫等，〈文苑三・徐鉉〉，《宋史》，卷 441，頁 13045；元・脫脫等，〈王禹偁〉，《宋史》，卷 293，頁 9794。因此，若要符合三人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官職時間，三人應在淳化元年到二年間校道藏。但所編道藏總共三千多卷，似不太可能不到兩年即完工，或者《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說是指三人完工時的官職。

132 元・脫脫等，〈王禹偁〉，《宋史》，卷 293，頁 9794。

133 宋・李昉，〈徐公墓誌銘〉，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黨援」之說。徐鉉以降臣的身分，而得到許多北方文士的推賞，且能利用此人脈庇護親屬，刑部、大理寺官員亦一致稱其受冤。太宗擴大範圍地貶逐相關臣僚，透露太宗對這位在朝中聲望日隆的降臣有所猜忌。站在徐鉉後學的角度，他們則失去了頗具影響力的領袖。

然而，徐鉉受貶過世後，其後學並未從此消沉，張洎的仕途反而一帆風順。淳化四年五月，他成為江南士大夫中首位翰林學士，不到兩年又升任執政大臣。不過，張洎經營仕途的模式與徐鉉在世時呈現相當不同的樣貌。首先，相較於太宗對徐鉉的複雜觀感，張洎「巧於逢迎」太宗。[134]淳化四年，太宗稱張洎為「江東士人中首出也」。[135]該年十月，太宗賦詩賜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張洎「上疏稱述，凡數千言，上覽而善之。」太宗特地召來宰相，表示：「張洎所上表，深喻朕旨」，於是將張洎的稱述交付史館，「許眾人就觀」。[136]可見張洎憑著過人的文辭能力，博得太宗的賞識。因此，太宗雖曾說張洎人品不高，也曾不留情面地否決張洎的意見，[137]但卻「卒喜之」。[138]

張洎贏得太宗賞識的另一面，卻是破壞徐鉉建立的南、北文士之友好關係。淳化四年十月，宰相李昉罷相，張洎草制，太宗欲授李昉左僕射，但張洎向太宗說李昉失職且無退意，使太宗打消為李昉遷官的念頭。[139]在制書中，張洎嚴詞批評李昉。[140]李昉原本厚待張洎，張洎似無理由落井下石，可能的解釋是，張洎欲藉此向太宗明志，表示自己不會因為私人交情而有所維護。此外，張洎向太宗指控判集賢院楊徽之中傷近臣，以致楊徽之被貶外放。[141]而蘇易簡與張洎同在翰林院時「尤不協」，淳化四年十月，蘇易簡遷參政，張洎「多攻其失」，蘇易簡去位後，張洎便取而代之。[142]尤有甚者，曾經大力舉薦張洎的寇準，[143]因

13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淳化五年十一月，頁 801。

13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十月，頁 757。不過，太宗緊接著說：「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學，亦無所取。」

13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淳化五年十一月丁巳，頁 800-801。

13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至道二年五月辛亥，頁 834-835、五月壬子，頁 835-838。

13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淳化五年十一月，頁 801。

13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4，淳化四年十月，頁 754。

140 宋・宋綬、宋敏求編，〈宰相十五・罷免一・李昉罷相制〉，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65，頁 319。

141 宋・楊億，〈翰林侍讀學士楊公行狀〉，《武夷新集》，卷 1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6 冊，頁 21。

14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至道元年四月，頁 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言語衝撞太宗而罷政；張洎為了自保，稱寇準曾在背後批評太宗。[144]此後，寇準對江南人不抱好感，[145]種下了真宗朝寇準與王欽若鬥爭的前因。

綜合上述，可以進一步總結徐鉉去世前後，太宗、北方文士、江南徐鉉後學的關係變化。太宗在對政權合法性的關注下，頗為倚重掌握儒教祭禮知識的李昉等北方文士，但卻對深得李昉等人敬仰的徐鉉有所猜忌。藉著道安一案，太宗將相關臣僚一概貶逐，或許正是太宗對融洽的南北文士關係加以警告。徐鉉在世時，南、北文士可稱友好，但卻未能為徐鉉及其後學贏得能與北士抗衡的職位；徐鉉去世後，張洎陸續攻擊數位北方核心文士，並成功博得太宗的青睞。正是由於皇帝的賞識，張洎才能成為江南降臣中第一位翰林學士與執政大臣。這對於真宗朝江南文士進一步佔據政治地位，具有轉折性的關鍵意義。

六、徐鉉崇拜唐玄宗的政治理念

相對於太宗朝，南、北文士的此弱彼強，本文將指出，徐鉉的江南後學，在真宗朝取得了與北士相抗衡的地位；其中關鍵因素則在於，真宗採納了他們所提供的一套論述政權合法性的思想資源。正是在此意義上，徐鉉的影響力並未因其去世而結束。本節與下一節將試著論證：徐鉉的政治理念成為其後學可資運用的思想資源，而成為真宗大中祥符時代神道禮儀的理念來源之一。本節將分析徐鉉頗具道教特色的政治思想，如何呼應祥符時期的諸多作為。

宋真宗祥符年間一年串的神道禮儀，至今仍讓人感到匪夷所思。揭開序幕的封禪禮，象徵王朝「宣示」統治成就達致太平。[146]然而，祥符時代從天而降的「天書」、西祀汾陰、聖祖降神、朝謁太清宮，並建立從中央玉清昭應宮到各州天慶觀的道教宮觀，[147]是祥符時代更讓人莫名所以之處。

143 見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傅增湘編，《宋代蜀文輯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4），卷 5，頁 15。

144 Koon-wan Ho, *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 （962-1023） and His Tung-Nien*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0), 109-110.

145 景德二年，撫州人晏殊應試童子科，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結果真宗將晏殊交給陳彭年教導。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0，景德二年五月，頁 1341。

146 參見張維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清華學報》2013 年第 3 期，頁 481-524。

147 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宋代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人的研究指出，真宗朝的神道禮儀有一仿照對象，即唐玄宗。[148]見諸史實，真宗對玄宗的仿效，達到令人訝異的地步。唐玄宗在開元十年、二十年，兩度西祀汾陰，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開元末，玄宗開始熱衷於道教神仙之術。開元二十九年（741），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在空中見到玄元皇帝傳「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語給玄宗，且賜玄宗類似天書的「靈符」於尹喜之故宅；天寶二載（743），玄宗追尊玄元皇帝為「大聖祖」；天寶七載（748），玄宗又稱在華清宮朝元閣見到聖祖，於是改朝元閣為降聖閣。[149]凡此，祥符時期聖祖賜天書之事皆與之雷同。

祥符時代仿效唐玄宗的痕跡，在神道禮儀展開的當下，就為臣僚所指出。祥符年間，孫奭（962-1033）於真宗決定祀汾陰后土後，提出十不可，最後一點說：

> 唐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150]

透露兩個觀點恰好相反的訊息，其一，神道禮儀的主導者，將開元視為美好的時代，而引導真宗仿效；其二，孫奭卻認為唐玄宗時姦佞當塗，以致損國，暗指仿效唐明皇並不能帶來太平盛世。祥符六年十月，真宗決定到亳州祀太清宮

治軍事論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頁 144-196；謝聰輝，〈北宋玉皇崇拜與祭祀〉，《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49-78。

148 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臺中：東海大學，1965），頁 82，指出「真宗的崇奉道教，大概是以唐明皇做範本的」；亦提及徐鉉對北宋道教的盛行應有重要影響，然未深論，見頁 53。另，杜樂，《宋真宗朝中後期「神聖運動」研究——以天書和玉皇、聖祖崇拜為切入點》（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鄧小南先生指導，2011），除了對祥符到天禧的神聖運動有詳細分析外，也指出真宗對唐玄宗崇道的模仿。

149 見卿希泰，《簡明中國道教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72-80；龍晦，〈敦煌文獻所見唐玄宗的宗教活動〉，《揚州大學學報》1997 年第 1 期，頁 25-34；陳海嶺，〈唐玄宗的崇道抑佛政策及其社會影響〉，《河南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6 期（1999 年 11 月），頁 16-18。這些研究指出，唐玄宗試圖以玄元聖祖幫助他建立太平盛世。

150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頁 17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老子，孫奭又上書批評：「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151]「外議籍籍」的說法，表示這樣的議論並非孫奭獨見。真宗看了孫奭的奏議，作〈解疑論〉昭示群臣，認為不能以天寶之亂而否定玄宗的其他作為，[152]卻也等於承認祥符大禮確有模仿玄宗的成分。

大中祥符五年，真宗與趙氏聖祖見面前夕：

> 上夢景德中所覩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153]

明白說出崇奉宋朝聖祖的背後，是以唐朝聖祖為仿效對象。對於澶淵之盟後，想要進一步強化政權正當性的真宗而言，創造等同李氏聖祖的趙氏聖祖，有助於彰顯趙宋帝國具有與唐帝國相等的歷史成就。

然而，唐玄宗晚年遭遇安史之亂，以致以唐玄宗崇道為政治典範的論調相當罕見，是什麼原因讓祥符時代選擇唐玄宗作為仿照對象？欲回答此問題，不得不注意徐鉉儒道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其由此而來對唐玄宗的崇拜。以下論之。

細讀徐鉉文集各篇碑銘，筆者認為〈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并序〉（以下簡稱〈崇道宮碑銘〉）一文所陳述的政治思想較為完整，以下先引述此文，再旁引其他碑銘，以對徐鉉的政治思想加以概括。〈崇道宮碑銘并序〉：

>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教化。教之大者，當由其本，則大道是已。夫道積乎中，動合於真，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若道不在焉，而守其籧廬，則莊周於是糠粃仁義，輪扁於是糟粕古書矣。夫孝本因心，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道本勤行，而宮觀壇墠所以尊道也。為政者有能，原聖人之旨以垂憲，崇列真之宇以薦誠，其殆庶乎。……銘曰：大哉道原，湛然常在，其質無象，其功不宰。君子得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啓煥靈場。乃闢隙荒，乃築宮墻。[154]

15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頁 1850-1851。
15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頁 1850-1851。
15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頁 1797。
154 宋・徐鉉，〈楊府新建崇道宮碑銘并序〉，《徐公文集》，卷 26，頁 178-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界定徐鉉文中的核心概念——**道**的涵義。在〈崇道宮碑銘〉中，道是君臣行教化之「本」，與天地、萬物、君臣的發生順序有關。就天與道的關係而言，徐鉉認為「天之造始於道」，[155]「道」是「天地」的根本，天地又是萬物之本。[156]因此，君臣行教化若能依於道，便是遵循根本的原理。

〈崇道宮碑銘〉亦論述如何以「道」行教化。徐鉉認為應讓「道積乎中」，即是君臣心中有道。但道如何能夠積乎中？徐鉉頗強調「**孝**」的精神情感，他認為：

> 域中之大曰道，百行之先曰孝，故孝心充乎內，必道氣應乎外。……用於邦國則臣節著，施於家庭則于道光，以之為政則民從乂，以之薦信則神降福，然則壇館之作焉得已乎！[157]

可見徐鉉宣稱心中有「孝」的情感，就能使自身充滿道氣。呼應〈崇道宮碑銘〉「孝本因心，而宗廟簠簋所以致孝也」。君主讓心中有道的方式，即是在宗廟祭祀中，讓「孝」的精神充斥內心。行孝的效用甚廣，包括臣節著、民從義、神降福。而讓內心充滿孝的方法則須憑藉特定的空間場所「壇館」。

君主行孝，道積乎中，將使「動合於真」。此「動」意指**儒術**的實踐：「故能舉堯舜周孔之法，奮禮樂刑政之用」，可見儒術是道的外顯運用。徐鉉認為：「黃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導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158]可見「道」曾由上古無為的帝王實踐，而後由老子、孔子形諸文字而傳後世。而**老子**扮演的角色又更為關鍵：

> 昔者老君伯陽憫大道之既隱，傷周室之既微，以為清淨無為道之本也，非建言不能盡其意；安上治民道之用也，非設教不能永其成。

155 宋・徐鉉，〈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濟太平宮碑銘有序〉，《徐公文集》，卷 25，頁 172-174。

156 宋・徐鉉，〈洪州始豐山興玄觀記〉，《徐公文集》，卷 28，頁 193：「聖人之言，道無不在，若乃域中歸其大，萬物恃之生，鴻化玄造，無德而稱已。」

157 宋・徐鉉，〈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徐公文集》，卷 12，頁 87。

158 宋・徐鉉，〈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徐公文集》，卷 12，頁 88-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乃著書于函關，以明清心之要，授禮于仲尼，以開垂世之統。[159]

徐鉉認為，「道」本質上雖是「清淨無為」，[160]其「用」卻有安上治民之效。為了傳授此道，老子乃著書五千言，並授禮予孔子。因此，所謂「堯舜周孔之法」，雖是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161]的經典，但還是由老子傳授，目的是以這些經典來「設教」，以實踐「安上治民」。

不過，從「道積乎中」到「動合於真」，還需要有具體的實踐場所，即〈崇道宮碑銘〉所謂：「道本勤行，而**宮觀壇墠**所以尊道也」，這也呼應到銘文「君子得之，勤行不怠。勤行伊何？啓煥靈場。乃闢隙荒，乃築宮墻」。要讓心中的道能充分實踐，必須透過宮館壇墠以「勤行」。「道」應如何勤行呢？徐鉉認為：

> 為科戒以檢其情性，為象設以致其誠明。情性平則和氣來，誠明通則靈符集。……斯實興化致理之方，還淳反朴之本。[162]

即遵守一定的「科誡」，面對神明的「象設」，以「檢情性」、「致誠明」，而成效是招來和氣、靈符，達到「興化致理」、「還淳反朴」的太平治世。合併前述，君主心中有孝，並在「壇館」依循規定的禮儀，便能實踐「道」以設教。其效用是：「廣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163]即發揮「無為」之道，雖是無為卻可無所不為，百姓將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教化。

對徐鉉而言，勤行道的壇館，經常是供奉道教**神仙**的宮觀。徐鉉在道觀碑記中經常談論神仙，如認為供奉三清的三清觀為「神仙之宅」。[164]又認為「神之命受於天，天之造始於道」，因此需要「申畫福鄉，聿崇仙館」。[165]在應聖

159 宋・徐鉉，〈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徐公文集》，卷 28，頁 191。
160 徐鉉認為「道」是清靜無為的，又見宋・徐鉉，〈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徐公文集》，卷 13，頁 93-94：「清淨玄默，道之基也」。
161 宋・徐鉉，〈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徐公文集》，卷 13，頁 92。
162 宋・徐鉉，〈宣州開元觀重建中三門記〉，《徐公文集》，卷 13，頁 93。
163 宋・徐鉉，〈茆山紫陽觀碑銘〉，《徐公文集》，卷 12，頁 85。
164 宋・徐鉉，〈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徐公文集》，卷 10，頁 77。
165 宋・徐鉉，〈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濟太平宮碑銘有序〉，《徐公文集》，卷 25，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宮碑銘稱：「建清宮，應真符。廢而興，神之扶。宮既成，道既行。校三官，朝百靈。」[166]總之，建壇館以勤行道，實際上是在壇館中供奉神仙。

綜上所述，可將徐鉉的政治思想加以概括：「道」居於天地之上，為萬物之所本；君主要讓內心充滿道，是要在宮觀壇墠秉持誠孝之心，遵循一定的科誡，供奉代表道的神仙。如此，君主的一切作為，將自然而然地合於道，施政作為就能實踐堯舜周孔的禮樂刑政。因此，「道」的本質雖是「無為」，施於外事卻能夠「無不為」，百姓將自然而然的受到教化，政治也將臻於合理的秩序。亦可見對徐鉉而言，儒、道並非二分，而是道為體、儒為用。[167]

根據上述，可以進一步分析徐鉉為何以唐玄宗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典範。首先，來自徐鉉對南「唐」的認同。唐朝奉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南唐自視為唐朝的延續，[168]因此也供奉玄元皇帝。南唐中主曾說：「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多。」聽了他的話的臣子王仲連回答：「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於亳州真元縣，文宣王出於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169]從王仲連的回答可看出，對南唐政權而言，聖祖玄元皇帝被視為他們的始祖，仍得到南唐人的尊崇。徐鉉在李後主墓誌銘中，提到：「皇天眷祐，錫祚于唐，……江淮之地，獨奉長安。」[170]可見入宋後，徐鉉仍聲稱江南繼承了唐朝的正統。

其次，來自玄宗崇道之做為與徐鉉理念的相合。唐玄宗在開元末、天寶年間對老子的崇拜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再下令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廟，並給玄元皇帝廟改名，如西京改太清宮，東京改太微宮，諸州改紫極宮，並選配道士，贈賜莊園。製作玄元皇帝神像，頒布天下，二月玄元降生日，諸州需設祭祀。[171]這些作為，正符合徐鉉以宮觀「勤行」道的方式。

172-174。

166 宋・徐鉉，〈洪州西山重建應聖宮碑銘并序〉，《徐公文集》，卷 26，頁 181。又如宋・徐鉉，〈崇修筠州祈仙觀記〉，《徐公文集》，卷 10，頁 76：「筠州祈仙觀者，東晉黃真君上升之地，因為道館。」；宋・徐鉉，〈池州重建紫極宮碑銘〉，《徐公文集》，卷 12，頁 87：「池州紫極宮者，本東晉之普明觀也。……實真人飛升之所。」

167 此政治思想自然不是徐鉉獨創，而應看作是徐鉉對儒家經典、道教文本的詮釋。分析徐鉉的思想來源，則已超出本文的論述範圍。

168 見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譯，《宋朝的太祖和太宗——變革時期的帝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頁 89。

169 宋・鄭文寶，《江表志》，卷中，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084。

170 宋・徐鉉，〈吳王隴公墓誌銘并序〉，《徐公文集》，卷 29，頁 197-198。

171 卿希泰，《簡明中國道教史》，頁 62-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徐鉉文集中，處處流露對玄宗時代的嚮往。如說：「開元中，尊崇至道，伸嚴祀典」，[172]可見「尊道」離不開「祀典」；在聽霓裳羽衣曲時稱「此是開元太平曲」。[173]基於道為體、儒為用的觀念，徐鉉認為儒教「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元，理自然也」。[174]玄宗一朝被徐鉉認為是儒教最盛的時代。

徐鉉之所以嚮往唐玄宗的時代，除了玄宗的作為符合徐鉉的政治理念，彼此間還有道教聖地的連結——茅山。根據學者考證，玄宗天寶時期最推崇也往來密切的道教派別為茅山道派，茅山著名道士司馬承禎、李含光，都深得玄宗禮敬。[175]茅山正在南唐國都金陵附近，長期居處南唐中央的徐鉉，與茅山道派多有接觸，而留下許多碑記詩文。[176]徐鉉作〈茆山紫陽觀碑銘〉，提到唐玄宗對「玄靖先生」李含光的「尊師重道」，並在其指引下修建茅山道館、整理道教經典。[177]而徐鉉學道的對象即是茅山道士王棲霞，[178]徐鉉所作〈復三茅禁山記〉，描述王棲霞來茅山建方壇、造高亭，使此地「復如開元、天寶之歲矣。」[179]透過茅山道派的連結，玄宗對徐鉉而言有更為親近的連繫。

徐鉉晚年貶於邠州，此處離長安附近的驪山不遠；玄宗華清宮降聖閣建於此山，即玄宗宣稱見到玄元皇帝降神之處。到了生命盡頭，徐鉉仍念念不忘玄宗朝的盛世，而寫下〈驪山靈泉觀碑〉：認為玄宗之德在於「孝惟奉先，仁不忘本」；玄宗實踐孝心的地方在「華清宮」，憑藉至孝之誠，乃得玄元皇帝親

172 宋・徐鉉，〈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68，頁 9226-1

173 宋・徐鉉，〈又聽霓裳羽衣曲送陳君〉，《徐公文集》，卷 5，頁 42。

174 宋・徐鉉，〈宣州涇縣文宣王廟記〉，《徐公文集》，卷 13，頁 92。

175 汪桂平，〈唐玄宗與茅山道〉，《世界宗教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63-71；卿希泰，《簡明中國道教史》，頁 64；鍾國發，《茅山道教上清宗》（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 123-126。

176 如宋・徐鉉，〈張員外好茅山風景求為句容令作此頌〉，《徐公文集》，卷 2，頁 15；宋・徐鉉，〈宿茅山寄舍弟〉，《徐公文集》，卷 4，頁 28；宋・徐鉉，〈茅山紫陽觀碑銘〉，《徐公文集》，卷 12，頁 85-87；宋・徐鉉，〈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徐公文集》，卷 12，頁 88-90；宋・徐鉉，〈復三茅禁山記〉，《徐公文集》，卷 13，頁 92-93。

177 宋・徐鉉，〈茆山紫陽觀碑銘〉，《徐公文集》，卷 12，頁 85-87。

178 宋・徐鉉，〈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徐公文集》，卷 12，頁 88-90。

179 宋・徐鉉，〈復三茅禁山記〉，《徐公文集》，卷 13，頁 9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接見，並授予靈符，結果是「太平之運五十斯年」。[180]而後文鋒一轉，言及宋朝的興盛，各種祥瑞事跡都集應，三秦地區的父老、百姓也期待皇帝親臨，期許重現開元盛世。銘文中再次重申，「河圖」、「真符」、「雲蓋」、「芝房」，都要「歸功聖祖」，而這是玄宗「孝思不匱」所致。[181]爾後，宋真宗的西祀，正應和了徐鉉所謂三秦父老的望幸之心；而趙氏聖祖、天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宮觀等作為，隱約呼應了徐鉉所期盼的重現玄宗之太平景象。

總之，鑒於安史之亂，唐玄宗天寶年間的崇道舉措，很少受後世推崇，徐鉉卻是少數例外。這至少有三層次的原因。第一，南唐自認延續唐朝，繼續崇奉玄元聖祖；第二，徐鉉師從茅山道士王棲霞，而與禮敬茅山道士的唐玄宗有進一步的連結；第三，徐鉉的政治理念是以至孝之心，配合道教宮觀實踐「道」，這在崇奉聖祖老子的玄宗朝得到實踐。不過，徐鉉於淳化三年過世，下距大中祥符元年已有十五、六年之久，徐鉉的政治理念不可能「影響」祥符時代。「事事慕效唐明皇」的祥符禮儀，之所以可能融合徐鉉的政治理念，還須藉其後學的運用，下節述之。

七、徐鉉與祥符時代的中介：王欽若、杜鎬、陳彭年

大中祥符時代上距唐玄宗已超過兩百五十年，以玄宗崇道作為仿照對象，顯得頗不尋常。當我們企圖追尋更直接有力的聯繫，就不得不注意主事者與南「唐」的深刻淵源，以及他們屬於徐鉉後學的身分。本節分析哪些人物主導了祥符時代的神道禮儀，以說明模仿唐玄宗出自於徐鉉後學利用其政治理念，儘管他們亦非原封不動地照搬徐鉉理念。

學界一般認為，「五鬼」[182]是大中祥符神道禮儀的幕後操手，然而，五鬼實可分為禮儀派和財政派，其中禮儀派為徐鉉後學，他們恐怕才是神道禮儀的構思者與推動者。《續資治通鑑長編》將「五鬼」之稱紀錄於祥符五年：

180 唐玄宗統治其實只有四十五年，西元 712-756。徐鉉所述唐玄宗事跡多發生於天寶年間，但多數時候徐鉉只稱頌開元，可能是天寶末的大亂，使天寶是否可稱為盛世，有所疑慮，故而籠統地以開元代稱唐玄宗的統治。

181 宋・徐鉉，〈驪山靈泉觀碑〉，《徐公文集》，卷 26，頁 181-182。

182 用「五鬼」來指稱結黨的士大夫，並非開始於北宋，南唐中主（943-961）時，馮延巳、馮延魯、魏岑、陳覺、查文徽五人已被稱做「五鬼」。見宋・馬令，〈黨羽傳下〉，《南唐書》，卷 21，頁 5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183]

我們無法就此推斷以「五鬼」稱呼王欽若等人最早出現於何時，只能說大概不會晚於祥符五年。然而，此條史料只說五人「交通」，並未指明五人主導祥符禮儀。以下透過分析五人的仕宦經歷，討論他們各自在祥符禮儀中佔據的位置。

首先看陳彭年（961-1017）。陳彭年的父親陳省躬，在南唐時即與徐鉉兄弟友善。[184]陳彭年所作徐鉉文集序，自言：「越在幼年，即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舉以攸同；入室之知，方子淵而豈異！」[185]可見陳彭年自幼即師從徐鉉，兩家且為世交。陳彭年在徐鉉的江南故舊中，雖屬後輩，但與眾人關係密切。如與潘慎修交情甚篤，潘慎修病危，便託陳彭年草遺奏。[186]真宗即位，陳彭年本在地方任通判，景德元年，翰林學士朱昂推薦陳彭年試館職，時任崇文院檢討的杜鎬、刁衍共稱：「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實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試，止用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187]所謂「名流」，應包括他們的老師徐鉉。真宗接受建議，於是陳彭年以破例的方式與杜、刁同任崇文院檢討，為清要館職。[188]此後，徐鉉年長的門生杜鎬，與年少的門

18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頁 1778。

184 宋・龍袞，〈陳省躬〉，《江南野史》，卷 7，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頁 5202。

185 宋・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徐公文集》，頁 4。

18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9，景德二年正月，頁 1307。

187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 8，《全宋筆記》第 1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頁 84。

188 元・脫脫等，〈陳彭年〉，《宋史》，卷 287，頁 9962。前文提及，徐鉉的北方友人對於提攜其故舊，發揮不少力量，但似也有例外。如陳彭年即因為「輕俊，喜謗主司」，而遭知貢舉宋白壓抑，而未能考取進士。而後，真宗景德四年，陳彭年參與了科舉條制的訂定，據稱「多因（宋）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實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7，景德四年十月，頁 1497。這或呈現南北文士間的矛盾並非晚至真宗朝才出現。但科舉條制並非陳彭年一人制定，至少還包含當時的翰林學士晁迥，此「杜絕請託」的辦法是否出自陳彭年針對宋白的舊怨，或可再加考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陳彭年，在景德末到祥符前期，長期共事於真宗朝成立的龍圖閣。[189]

王欽若（962-1025）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南唐舊臣。其父在南唐以明經登第，與杜鎬同榜，當時科舉取士人數寡少，同年之間的關係較容易親篤。王欽若父早逝，其祖入宋後，一直擔任幕職州縣小官。欽若祖在冀州任判官時，正好太宗北伐，王欽若至行在獻〈平晉賦〉。[190]前文提及，隨太宗北征的文士，只有徐鉉為江南人，而王欽若又是杜鎬同年之子，不無可能徐鉉已對王欽若留下印象。但王欽若於淳化三年登第，徐鉉已經外貶，兩人實際有何往來難以知曉。

不過，考察王欽若的人際網絡，不難看出他與徐鉉故舊多有往來。王欽若與前述徐鉉後學中第一位執政大臣張洎聯姻，他將女兒許配給張洎長孫。王欽若登第後，只為選人，於地方任小官。對王欽若仕途有關鍵性助益的，是太宗末年舒雅的推薦，使王欽若得以「特改祕書郎」，成為京官。[191]大中祥符二年，王欽若已為執政，此時舒雅正掌管舒州靈仙觀，王欽若推薦他「淡於榮利」，於是舒雅回京任直昭文館。[192]此外，與王欽若「親厚」的高紳亦為江南人，[193]且也與徐鉉相識。高紳在太宗朝登第後，要到南荊縣赴任，徐鉉為他寫贈序。[194]而他與陳彭年在祥符時期長期合作，更為學界共知。總之，不論就王欽若的家世背景或交遊網絡來看，他都與徐鉉的江南故舊群關係密切。

王欽若與陳彭年的思想背景也都頗具道教色彩。徐鉉入宋後所寫〈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乃為掌此道觀的女道士陳体元所作，陳体元正是陳彭年父陳省躬之妹，徐鉉稱陳氏「積善之報，宜生仙才」。[195]可見陳彭年的老師與家世背景皆有濃重道教色彩。王欽若好神仙事，史有明文，墓誌指他「常練氣於朝霞，期脫屣于塵世」，可見他渴望成仙。[196]《續資治通鑑長編》作者李燾即認

189 陳彭年任於龍圖閣從景德四年到大中祥符五年；杜鎬則從景德二年任至大中祥符六年。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6，景德四年七月，頁 1474；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1，景德二年十一月戊申，頁 1373；卷 79，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頁 1803；卷 81，大中祥符六年九月，頁 1849。

190 宋・夏竦，〈贈太師中書令冀國王公行（欽若）狀〉，《文莊集》，卷 2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9-10。

191 同上註，頁 9-11。

19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1，大中祥符二年，頁 1591。

19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7，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庚子，頁 2008。

194 宋・徐鉉，〈送高紳之官序〉，《徐公文集》，卷 24，頁 165。

195 宋・徐鉉，〈邢州紫極宮老君殿記〉，《徐公文集》，卷 28，頁 191。

196 宋・夏竦，〈王公（欽若）墓誌銘并序〉，《文莊集》，卷 29，《景印文淵閣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王欽若主導的天書、祠祭運動，來自素所蓄積的道教信仰。[197]

至於五鬼中的丁謂與林特，在神道禮儀中的職務，主要在於財政管理。丁謂是蘇州人，過去為吳越統治範圍。景德二年五月，丁謂任權三司使，成為財政官僚。封禪之前，真宗問丁謂國家財政，丁謂回答「大計固有餘矣」。祥符二年二月，升任三司使，祥符五年九月，成為參知政事。[198]林特為江南降臣，曾謁南唐中主李景，而任蘭臺校書郎之官。[199]但其早年的活動缺少其他資料，也看不出與徐鉉故舊是否往來。林特於景德元年已為鹽鐵副使，長期任丁謂下屬，祥符五年九月，丁謂升任參政，林特成為權三司使。[200]丁謂與林特關係親密，據稱林特「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特」。[201]可以說，從景德到祥符前半期，丁謂與林特的主要貢獻在主持財政。宦官劉承珪為楚州人。據學人研究，劉承珪也頗具理財能力，至遲在景德四年，劉承珪回到內藏庫，善於理財的他，配合在三司的丁謂等人，為真宗的神道禮儀活動提供足夠的財力支持。[202]

以上討論了五鬼在祥符年間的職務，要言之，儘管丁謂、林特、劉承珪也是「五鬼」成員，但他們在祥符前半期擔任財政官僚，難以認為他們是神道禮儀的幕後操手。以下進一步討論徐鉉後學主導祥符神道活動的相關記載。

王欽若以「城下之盟」詆毀寇準的一條史料，為學界熟知。在這條史料中，真宗聽取了兩個人的意見，其一即王欽若。王欽若向真宗說：「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二是杜鎬。該史料稱「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203]真宗問杜鎬河

庫全書》第 1087 冊，頁 18。

19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8，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頁 2030。

198 參見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93-248。丁謂的人際網絡頗為複雜，參見張其凡，〈寇準與丁謂鬥爭事實考述〉，《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186-220。

199 元・脫脫等，〈林特〉，《宋史》，卷 283，頁 9564。

200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8，景德元年十月，頁 127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己丑，頁 1778。

20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93，天禧三年六月，頁 2153。

202 丁義玨，《北宋前期的宦官：立足於制度史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鄧小南先生指導，2013），頁 102-105。

203 王化雨指出，君主對每日是誰直宿絕非不知，真宗夜對杜鎬其實是有意為之。見王化雨，〈宋朝君臣的夜對〉，《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5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洛書是怎麼回事，杜鎬回答：「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204]這條史料至少透露兩個訊息：其一，天書的理論來自於「河圖洛書」，這點超過本文討論主題，姑且不論；其二，王欽若和杜鎬共同促成此事，而且他們的貢獻是在思想理論方面。《東都事略》杜鎬本傳，也述及王欽若和杜鎬認為河圖洛書為聖人神道設教的說法，並加上這一句：

> 議者謂祥瑞事啟自欽若而成於（杜）鎬云。[205]

同樣說明，在後人的認知中，祥符神道禮儀未必出自「五鬼」的策劃，最初的發想來自王欽若與杜鎬二人。

王欽若與杜鎬參與神道禮儀的記載，亦見於約寫作於仁宗朝的國史孫奭本傳。據載：

>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206]

被點名的五人中，就有三人（王欽若、陳彭年、杜鎬）屬於徐鉉後學。丁謂如前所言，主要負責財政。他們在祥符禮儀中扮演的角色，恐怕不能一概而論。[207]

---

20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7，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頁 1506-1507。

205 宋・王稱，〈杜鎬〉，《東都事略》，卷 4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頁 3。

20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頁 1699。

207 至於陳堯叟，既非江南士大夫，也非「五鬼」之一。他是四川利州路閬州人。他雖然支持神道禮儀，且長期與王欽若共事於樞密院，但目前看不到任何陳堯叟與王欽若等人交好的史實紀錄。與陳堯叟關係密切的應是以种放為代表的北方道派。真宗時，种放多次來朝，與其「有舊」、時為執政的陳堯叟，常為真宗傳話給种放，种放在終南山時，亦與陳堯叟不時唱和。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2，咸平五年九月己酉，頁 11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67，景德四年十月甲辰，頁 1496；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頁 1652。种放的道教思想，也與江南道派有所不同，他們雖然學習服氣辟穀之術，但不信羽化飛升之事。觀其與真宗的往來，也多討論如何為政，而不談神仙之事。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2，咸平五年九月戊申，頁 11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頁 1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王欽若與杜鎬，陳彭年的角色也相當重要。祥符元年「起居詳定所」設立，陳彭年為負責人，此機構的職責即為主導神道禮儀的進行。當時因為陳彭年修起居注，故而在起居院置詳定所，可見詳定所的設立一開始就有配合陳彭年的傾向。祥符六年，真宗在盛讚陳彭年精詳典禮後提到：

> 詳定所事無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司不可廢也。[208]

可見陳彭年長期主持詳定所。從真宗的話也可見，當時有人討論詳定所的存廢，於是該年八月改名為禮儀院，似有正名的用意。並命陳彭年和趙安仁為知禮儀院，但不久趙安仁即去職。[209]

以上的分析顯示，在祥符時代的禮儀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杜鎬、陳彭年、王欽若。[210]其中杜鎬與陳彭年為徐鉉門生，王欽若則與徐鉉的江南故舊關係密切。相較於太宗，真宗對入宋已久的江南降臣顯然不再猜忌，他採納了這幾位徐鉉後學的禮儀觀點，造就了處處仿效唐玄宗的祥符時代。

天禧元年（1017）正月，神道禮儀活動推向高潮，真宗奉上玉皇、聖祖冊寶。同年十一月，胡克順上呈刊刻出版的徐鉉文集。[211]兩件事看似毫不相關，實際上卻有值得玩味之處。胡克順在〈進徐騎省文集表〉提到：

> 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名，逮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頗為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尚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之右。……每思編緝，尤懼舛譌。數年前，故叅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夙志，假以全本，并茲冠篇。乃募工人鏤形鏤板，竹簡更寫，無媿於前修；綈几

20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0，大中祥符六年六月，頁 1831。

20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81，大中祥符六年八月，頁 1845。

210 另一可注意的角色是王中正。他原曾在南康軍從事商業活動，後於茅山學習道術，並得劉承珪引薦給真宗，而為真宗傳達「神人」之語。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1，大中祥符二年二月，頁 1593-1594。王中正的角色充滿了神祕性，他對祥符禮儀有何影響，難以深究。但就仿效唐玄宗的一連串禮儀而言，王中正似不可能具備足夠的理論知識。

211 胡克順為江西洪州胡氏家族的成員。胡家與徐鉉關係密切。見宋・徐鉉，〈洪州奉新縣重建闔業觀銘碑并序〉，《徐公文集》，卷 26，頁 179-1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迴觀，願留於睿覽。……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212]

可見胡克順從陳彭年手中獲得徐鉉文集，才得以完成刊刻的心願。特別提到「因臣屢言」，透露陳彭年對刊刻文集一事有所顧慮。從晏殊（991-1055）所作徐鉉文集後序可知，早在祥符九年以前，胡克順已將徐鉉文集「鏤板流行」，[213]但直到神道禮儀大功告成的天禧元年才上呈真宗。此時間點令人聯想，所謂「頗爲後進之宗師」、「克著一家之言」，是否暗喻著徐鉉「蓋處諸公之右」的政治理念，已由其後學加以發揮，成就了祥符時代呢？陳彭年在祥符年間先後主持詳定所與禮儀院，為大禮的主導者；又是與徐鉉相當親近的門生，並長年保有徐鉉文集在身，若說祥符大禮沒有參考、利用徐鉉的政治思想，恐怕是不太可能。

總之，基於兩點事實，筆者認為徐鉉的政治理念，為祥符神道禮儀的思想來源之一：其一，由於唐玄宗晚年爆發安史之亂，推崇玄宗道教作為的言論相當少見，這使祥符時代「事事慕效唐明皇」顯得很不尋常，而徐鉉正是唐玄宗的積極崇拜者。其二，主導祥符神道禮儀的三位主要人物，王欽若、杜鎬、陳彭年，皆為徐鉉後學。除非認為這些僅是巧合，否則有理由相信，他們採納、運用了徐鉉思想。對徐鉉後學而言，徐鉉思想是他們親近可取的資源，事實上，他們成功說服真宗在祥符時期仿效唐明皇的諸多作為，也為自身爭取到與北方文士並駕齊驅的政治地位。[214]

八、結語

聚焦於徐鉉的人際網絡與政治理念，本文討論宋初一個特殊群體——徐鉉

212 宋・胡克順，〈進徐騎省文集表〉，宋・徐鉉，《徐公文集》，頁 1。

213 宋・晏殊，〈後序〉，宋・徐鉉，《徐公文集・附錄》，頁 219。

214 本文討論從太宗到真宗朝，徐鉉及其後學政治地位的變化，並在此脈絡下，指出徐鉉的政治理念如何成為祥符禮儀的思想資源之一。不過，徐鉉思想既經其後學轉述、闡發，以後設敘事的角度而言，自然也難免依照當事者的理解或需求，而有所修改甚至變形。並且，這也不意味從此脈絡能夠完全解釋祥符神道禮儀的展開。例如，唐朝聖祖老子為純粹的道教或道家性格；趙宋聖祖則曾經「感生」為黃帝。兩者的差異，便非仿效唐玄宗所能解釋。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頁 1797-17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其後學的仕宦際遇與他們在宋初政壇發揮的作用，藉此探討宋初南、北文士互動的一個別具意義之面向，並勾勒兩股勢力自太宗到真宗朝的變化。

徐鉉以其博學知識，入宋後得到以李昉為核心的北方文士突出的禮重，這不僅表現在他們與徐鉉的密切往來，也表現在他們不遺餘力地引薦徐鉉的江南後學。這使徐鉉及其後學享有一般降臣缺乏的優勢：他們不需依靠科舉出身，便有機會進入館職，並參與了太宗朝三大類書的編修。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北方文士之所以樂於親近、舉薦徐鉉及其後學，前提也在於了解太宗並不信任這些降臣，江南降臣不可能佔據重要職位。相對於北方核心文士不少人位居宰執，徐鉉及其後學多半擔任無實權的文字工作。

文士之所以能夠得到太宗、真宗的重視，關鍵因素之一是他們對儒教祭禮的知識掌握，有助於王朝統治正當性的建構，北方文士得太宗重視的關鍵之一即在與此。另一方面，徐鉉崇拜唐明皇的儒道合一理念，也為君主統治的合法性提供另一套可能的理念。儘管徐鉉在世時，其政治理念僅存於筆墨之中，未得太宗重視，但其門人後學中的三位人物：王欽若、杜鎬、陳彭年，取得了真宗的信任，而主導了祥符禮儀的進展。祥符時代明顯仿效唐明皇的諸多作為，恐怕並非純粹的巧合，而是徐鉉後學援引、利用了徐鉉的政治理念。徐鉉及其後學頗具道教思想的政治合法性論述，也在祥符時代的實際政治活動中，抬升了能見度。

綜合前輩學者的研究，可以對真宗在祥符時代選擇仿效唐明皇的原因與影響再加梳理。學者已經指出，宋太宗除了對儒教之外，也已表現出對道教的興趣。[215]真宗在祥符時代的崇道舉措，可說是有來自太宗的鋪墊。徐鉉後學得以說服真宗仿效唐明皇，即應以此背景為基礎；儘管對唐明皇的仿效，也使祥符時代的崇道方針，與太宗朝有明顯區隔。另一方面，從真宗朝的黨爭來看，以寇準、王旦為首的一派北士，與以王欽若、陳彭年為首的一派南士之間的矛盾，[216]最關鍵處似非雙方的南北地域之別。他們的前輩，北方文士李昉、王祜（王

215 參見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頁 57-70；林瑞翰，〈宋太祖太宗之御將及太宗之治術〉，《臺大歷史學報》第 5 期（1978 年 6 月），頁 53-71；竺沙雅章，〈宋初政治與宗教〉，《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3 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125-152；張其凡，〈呂端與宋初黃老思想〉，《宋代人物論稿》，頁 267-287。張維玲則認為，太宗統治後期對道教的重視更勝前期。見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與解構 960-106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梁庚堯先生指導，2015），頁 155-156。

216 學界對祥符時代的政爭有詳細的研究，參見 Ho, *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160-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旦父）、南方文士徐鉉、張洎等在太宗朝曾經頗為友好。南、北文士在真宗朝的權力之爭，事實上是因為真宗採納了南方文士的政治理念，並給予南士足以與北士抗衡的政治地位，從而瓜分了北士之從政空間，雙方劇烈的權力競爭乃不可避免。而真宗也在南、北文士的「異論相攪」中，更加凸顯皇權的權威性。[217]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頁 126-141；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論》，頁 311-339；張其凡，《宋代人物論稿》，頁 221-263；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頁 102-128。真宗朝的政治鬥爭，當然不只發生在王旦、王欽若等人之間，可參見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

217 真宗以「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來解釋為何任用寇準，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13，熙寧三年七月，頁 5169。這雖出自熙寧間曾公亮的追述，但真宗確實並用南、北士，使「異論相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宋・王林著，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宋・王曾，《王文正公筆錄》，《百部叢書集成》第1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百川學海》己集。

宋・王稱，《東都事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王應麟，《玉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史溫，《釣磯立談》，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宋・田況，《儒林公議》，《稗海》第27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宋・佚名，《江表餘載》，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宋・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宋・岳珂撰，吳企明點校，《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宋・夏竦，《文莊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徐鉉，《徐公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宋・祖無擇，《龍學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袁褧，《楓窗小牘》，《百部叢書集成》第129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寶顏堂秘笈》第25冊。

宋・馬令，《南唐書》，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陳彭年，《江南別錄》，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宋・丁謂，《丁晉公談錄》，《百部叢書集成》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百川學海》癸集。

宋・楊億，《武夷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楊億口述，宋庠整理，李裕民輯校，《楊文公談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歐陽修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江表志》，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宋・錢若水等修，范學輝校注，《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全宋筆記》第1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宋・龍袞，《江南野史》，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57。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民國・傅增湘編，《宋代蜀文輯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4。

二、近人論著

丁義玨，《北宋前期的宦官：立足於制度史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鄧小南先生指導，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內弘一，〈北宋時代の郊祀〉，《史學雜誌》第92編第1號，1983年1月，頁40-66。

王化雨，〈宋朝君臣的夜對〉，《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52-61。

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北京：中華書局，2010。

方震華，〈正統王朝的代價－後梁與後唐的政權合理化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35期，2005年6月，頁55-84。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伍伯常，〈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論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0期，2001年11月，頁1-31。

何冠環，《論宋太宗朝之趙普》，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羅球慶先生指導，1979。

———，《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

杜樂，《宋真宗朝中後期「神聖運動」研究－－以天書和玉皇、聖祖崇拜為切入點》，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鄧小南先生指導，2011。

汪桂平，〈唐玄宗與茅山道〉，《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頁63-71。

沈松勤，《宋代政治與文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周佳，《聽政・文書・集議：北宋仁宗朝日常政務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鄧小南先生指導，2010。

林瑞翰，〈南唐之經濟與文化〉，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2輯第2冊，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年，頁137-144。

———，〈宋太祖太宗之御將及太宗之治術〉，《臺大歷史學報》第5期，1978年6月，頁53-71。

金傳道，〈徐鉉三次貶官考〉，《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第19卷第3期，2007年5月，頁99-103。

竺沙雅章，〈宋初政治與宗教〉，《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3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125-152。

———，方建新譯，《宋朝的太祖和太宗——變革時期的帝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的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卿希泰，《簡明中國道教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

孫克寬，《宋元道教之發展》，臺中：東海大學，1965。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張其凡，《宋代政治軍事論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張維玲，〈宋太宗、真宗朝的致太平以封禪〉，《清華學報》2013年第3期，頁481-524。

———，《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與解構960-106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梁庚堯先生指導，2015。

張興武，《宋初百年文學復興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9。

郭伯恭，《宋四大書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陳元鋒，〈宋太祖朝翰林學士述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56-61。

陳海嶺，〈唐玄宗的崇道抑佛政策及其社會影響〉，《河南大學學報》第39卷第6期，1999年11月，頁16-18。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鄒勁鳳，《南唐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謝聰輝，《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

鍾國發，《茅山道教上清宗》，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龍晦，〈敦煌文獻所見唐玄宗的宗教活動〉，《揚州大學學報》1997 年第 1 期，頁 25-34。

龔延明，〈宋代學士院名物制度志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頁52-60。

———，《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Fang, Cheng-hua.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875-1063).* Saarbrücken :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Ho, Koon-wan. *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 (962-1023) and His T'ung-nien.*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nteraction of North and South Literati and the Rising of South Literati During the Early Song: An Investigation on Xu Xuan and His Disciples

Chang, Wei-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Xu Xuan(徐鉉) and his disciples' official caree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tical affairs. We usually consider that surrendering subjects in the south had been discriminated during the early Song. Xu Xuan, having most brilliant scholarship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however, earned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rom the nucleus among the north literati headed by Li Fang(李昉), and therefore Xu Xuan and his disciples, on the one hand, had more chances to enter the court than other surrendering intellectuals.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Xu Xuan's death, his disciples, Du Hao(杜鎬), Chen Pengnian(陳彭年), and Wang Qinruo(王欽若), gained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s trust. They utilized their teacher's political concept and successfully convinced Zhenzong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Xuanzong of Tang in the era of "The Auspicious Talisman of Great Centrality" (大中祥符). Xu Xuan's disciples' political weight thus had increased up to the unprecedented level .

Keywords: Xu Xuan, Li Fang, Wang Qinruo, The Auspicious Talisman of Great Centrality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